



21世纪人类学文库

文化人类学 论纲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 Introduction

罗康隆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人类学论纲/罗康隆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5

(21 世纪人类学文库; 1)

ISBN 7-81112-020-8

I. 文... II. 罗... III. 文化人类学—研究

IV. 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7383 号

文化人类学论纲

罗康隆 著

责任编辑: 周元晖 蔡红华

装帧设计: 刘 雨

责任校对: 段建堂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3.25

字 数: 396 千

印 数: 0001 - 1000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112-020-8/C · 101

定 价: 38.00 元

社 址: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 - 5033244 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 - mail: market@ynup.com

《21 世纪人类学文库》总序

中国的人类学经过 20 世纪 80 年代的重建，到 90 年代以来，呈现出兴盛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老中青学术梯队的框架已搭建起来，中青年学者已开始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中坚力量。经过十年的恢复性发展，各类研究机构已经完善，研究人员已经到位，主要的任务就是人才的培养问题。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进入高等院校学习人类学民族学知识的学子，到这时已发展成熟成为学科的骨干力量。这些学者大多集中在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人类学教学研究机构。其中许多人在国外求学数载，直接沟通了中国和世界的研究。

2. 科际整合的研究取向显示出人类学无论在理论建设还是在具体的应用中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一方面人类学工作者自我超越原有的兴趣，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人类学又与其他的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相结合，以望取得研究上的新突破。如有的高等学校利用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学科群的优势，重视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将自然科学研究的技术和方法运用到探索族群形成的生物遗传特征及其与文化的关系；与生态学、经济学等学科结合，探讨民族文化、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与生物学、物理学和古地理学等自然科学技术相结合，对早期人类的环境和生态进行研究。科际整合的方法有利于打破学科界线，达到各学科之间理论和方法的互渗和借用。这种科际整合的研究方法有可能催生新的边缘学科，并产生原创性的理论方法，同时，多角度的研究取向更易



于我们认识社会生活的本质。同时，有关人类学的学术会议和交流活动大大增多。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国各地召开的有关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历史学、法学等相关学科的学术研讨会达七十余次。这些高层次的研讨班既整合了人类学研究的学术群体，又扩大了人类学在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影响。

3. 学科建设取得重大成绩。2002年1月，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的人类学，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的民族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这为新世纪人类学民族学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目前全国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如中山大学目前有人类学和考古学两个本科专业，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和民族学四个硕士学位授权点，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两个博士学位授权点。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获得了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相关的高校和科研机构都分别开展了规模较大的科研项目，特别是云南大学先后两次组织了大规模的民族村寨调查，对全国55个少数民族村寨进行了全面的实地调查，出版了一套完整的民族村寨调查丛书。中国的人类学界必将以丰硕的研究成果，迎接2008年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在中国（昆明）的召开。

4. 人类学知识的应用与普及已开始影响我国的社会经济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一百多年前，美国人类学家泰勒曾说过，人类学是改革者的学科，人类学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学科。费孝通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真正的应用人类学必须是为广大人民利益服务的人类学。”从人类学在中国的传入与发展来看，中国人类学一开始就有很强的应用性，到90年代已能直接介入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如人类学专家在区域文化策划、综合社会评估、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和保护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西部大开发中，人类学专家参与的民族省区文化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人文旅游规划、文化设计和社会评估已多次用于云南、内蒙古、新疆、青海等省区的政府咨询和决策。

另外，由于深厚的学术传统和特殊的资源优势，人类学学科较易于直接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如人类学者直接参与社会发展计划，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批人类学者参与一些国际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等）在华的发展项目的评估。在这方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参与的南昆铁路的建设对沿线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人

类学家参与的艾滋病与人类行为的研究，云南大学人类学家主持的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中山大学对江西、新疆、甘肃、宁夏、云南、广西、四川、贵州、广东等地的社会评估，已经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人类学对社会发展的实用价值。因此有人就认为这是“人类学在行动”。

不仅如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已开始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认知方式。人类学研究的边缘视点和“异文化”视角使之能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史诗。比如说，人类学对民俗的研究已在改变人们对农民生活方式的看法，人们对他们的宗族观念、他们的民间信仰仪式等都开始有一个客观的审视，而不是单纯地以“封建迷信”斥之。对人类学知识的应用要有一个普及化的过程，让人类学的知识真正服务于人民，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就是“走向人民”。这是知识回归大众的过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各国人民的交往增多，文化的冲突不可避免，人类学研究的“异文化”视角为我们消解这种文化差异而带来的冲突提供了工具。

21 世纪的中国人类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前景。为了适应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和本土化发展的需要，由云南大学人类学系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原先研究的基础上，组织有关学者编写了一套反映当代人类学最新研究成果的系列教材《21 世纪人类学文库》。厚集薄发，正是一代代学人的努力，使今天中国的人类学研究蔚为大观。这一套教材既凝聚着编著者们心血，而长期以来许许多多人类学者的涓涓细流汇成了今日学科发展的汪洋大海，则是这一套教材编写的不竭源泉。“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如果说弗雷德曼（Maurice Freedman）所预言的“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到来为期不远的话，我们愿这一套教材的出版能引导更多的雏凤走上对人类学的不懈追求之路，催生人类学的中国时代！

《21 世纪人类学文库》编委会

2005 年 10 月

目 录

绪 论 理解与应用的文化人类学	(1)
一 文化研究理论的演替	(1)
二 文化人类学的理解与应用	(8)
三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15)
第1章 民族文化的形成	(23)
第一节 民族·文化与生境	(23)
第二节 民族与文化的发生	(28)
第三节 文化生存的外因系统	(40)
第四节 文化生存的内因系统	(49)
第2章 民族文化的发展	(55)
第一节 文化发展的度量指标系统	(55)
第二节 民族文化发展的一般性	(61)
第三节 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性	(67)
第3章 民族谱系	(75)
第一节 构拟民族谱系的原则	(75)
第二节 民族谱系构拟的多样性与语言谱系的价值	(79)
第三节 文化人类学中的民族志方法	(87)
第4章 族际关系	(94)
第一节 族际关系归类的原则	(94)
第二节 族际关系的类属	(100)



第三节 族际互动与文化制衡	(109)
第5章 民族演化	(119)
第一节 族内演化规律	(119)
第二节 族际演化规律	(124)
第三节 族际演化的涵化与同化	(128)
第四节 族际演化中的族群认同	(133)
第6章 文化跃迁与民族现代化	(139)
第一节 文化跃迁的潜势法则	(139)
第二节 人类文化跃迁的实践	(145)
第三节 民族现代化	(153)
第7章 民族的生存空间	(160)
第一节 民族生境的实质	(160)
第二节 民族分布的计量描述	(165)
第三节 民族分布的变迁	(168)
第8章 民族经济生活方式	(173)
第一节 民族经济生活类型	(173)
第二节 民族经济生活样式	(182)
第三节 民族经济生活差异得失综述	(188)
第9章 民族与语言	(195)
第一节 民族语言的特性	(195)
第二节 语言的社会功能	(200)
第三节 萨皮尔-沃尔夫假设与母语排抗效应	(209)
第10章 民族与习俗	(216)
第一节 习俗的实质	(216)
第二节 民族习俗的构成	(222)

第三节	习俗的社会功能	(228)
第四节	习俗的演化	(235)
第11章	社会组织	(239)
第一节	社会组织的性质与类别	(239)
第二节	社会组织的功能	(249)
第12章	科学技术	(253)
第一节	科学技术的社会性与民族性	(253)
第二节	科学技术的相对性	(260)
第三节	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	(266)
第四节	地方性知识价值分析	(272)
第13章	信仰与宗教	(283)
第一节	社会信仰的内涵与宗教的实质	(283)
第二节	宗教的社会功能	(289)
第三节	宗教发展的制约因素	(295)
第四节	宗教与科学的联系与区别	(302)
第14章	伦理道德	(310)
第一节	伦理道德的实质	(310)
第二节	伦理道德的演化	(314)
第15章	文学艺术	(318)
第一节	文学艺术的实质	(318)
第二节	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	(322)
第三节	文学艺术与象征人类学	(325)
第16章	文化多样性与人口、生态及资源	(329)
第一节	文化多样性与人口发展	(329)
第二节	文化多样性与生态保护	(336)

第三节 文化多样性与资源利用	(343)
主要参考文献	(351)

绪 论

理解与应用的文化人类学

一 文化研究理论的演替

人类为什么要认识自己？人类能认识自己吗？人类怎么去认识自己？人类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就是在回答人类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的问题。人类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创建了不同的学科，诸如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法学等学科，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去进行探索。19世纪中叶，西方学术界进入一个分科日益纷繁的时期，通过对文化的研究来理解人性的学科——人类学，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人类学是通过研究人类的文化来理解“人”的学科，或通过研究时空和结果中的人类文化来理解人类共性（human commonality）、自性（self-identity）和他性（otherness, or other's identity）的学科。该学科形成的基点是“文化”，特别是异域民族的文化，成为西方学术界探讨人性的主要参照物。当时欧洲大陆学者在建构和使用这一术语时，主要是针对那些未见于文献的新发现的民族文化研究对象，因为这些民族的文化在他们看来是“代表着人类的史前时代”，但他们又与当时的“先进民族”并存于一个地球上。于是，对“落后”民族文化的研究成为了西方人类学研究的主题。

文化人类学在19世纪中期形成，并不是一次偶然的巧合，而是一连串政治、经济原因和学术背景的综合作用的结果。英国在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后，尤其是工业革命后形成了“世界工厂”，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它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大洲，成为了“日不落帝国”。统治殖民地居民需要有关这些居民生活和文化的某些最起码的知识，于是，“殖民地经



营开始有计划地进行，最终征服非欧洲的问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一切意味着一个有关非西方的大胆的类型化和图式化的过程正在进行”。^①因此，研究“野蛮人”的生活，对英国特别重要。这种研究的迫切性包括贸易的、夺取的、统治的目的。^②以前，殖民强国多满足于沿海滩头的移民占领和海上通道的控制。到19世纪中期，为了与其他殖民宗主国之间进行争夺，如何对已经占有的殖民地实行有效的统治自然而然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如要稳定地占有殖民地就必须对其实行直接统治，要实现直接统治就得研究当地民族的文化。于是，对非西方民族文化的研究就成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研究重心。

文化人类学的形成还是资料积累的产物。人类开始积累异民族的资料虽然很早，但直到19世纪以前，这种资料的积累还具有明显的探险性和偶然性。资料本身片面零散，既难以取信，又无法加以验证和核实，这样只好姑且相信，以附寄于其他学科的资料堆积之中。进入19世纪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有关异民族文化的资料数量急剧增加，其他学科的资料库难以容纳；二是这些资料基本上可以反复验证，也可以补充修正，甚至可以使当代人去切身体验；三是这些资料开始具有某种稳定的内在的关联性，它不但为不同民族文化间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旁证材料，同时为特定文化的演化分析提供了依据。在这样的基础上，一门专以研究异民族文化为对象的学科应运而生。

人类学作为一门正式学科，可以说是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但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这个术语首次出现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其希腊词源是 Anthropos（人）+ Logic（研究），即对人的研究。19世纪中期以后，人类学的理论开始形成，人类学的学术组织、期刊、专著纷纷涌现，专业的人类学研究队伍也不断出现。1839年法国成立巴黎民族学学会；1842年在纽约成立美国民族学学会；1843年成立英国民族学学会，于1871年改名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皇家人类学研究所；1869年柏林、1870年维也纳、1873年斯德哥尔摩、1879年华盛顿等建立了各国的人类学学会。随之人类学的专业刊物也开始发行，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刊物有法国的《民族学学会通报》、德国的《民族学杂志》、美国的

① 庄锡昌、孙志民编著：《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构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② 参见C. A. 托卡列夫《外国民族学史》，汤方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25页。

《美国人类学家》、荷兰的《国际民族学文献》等。还有各大学对这门学科也相继接纳。随着人们对文化认识的加深或者是为了更加系统全面地认识人类文化,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出现各自的发展轨迹。在北美,人类学发展出了四个分支学科:体质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这四个分支学科都发展成为独立学科,而文化人类学从中分析出来后成为一门专门从文化这个角度对人进行研究的科学。

由于人类学在各国家、各地区有不同的传统,因而其研究的方法和内容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美国,着重研究人类文化的起源、发展和流变过程,分析比较世界各地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与普遍性,而将这门学科称为文化人类学。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的学者主要研究不同民族的社会类型,侧重其社会组织、结构制度、功能及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等,而被称为社会人类学或民族学。实际上,民族学、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所指的都是同一门学科。他们只是研究的出发点有差异而已,他们的研究对象与内容,甚至需要得出的结论也是类似的。正如文化人类学泰斗列维-施特劳斯所指出的那样:“文化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所包括的范围其实是相同的,只是前者从技术和事物的研究出发,然后及于决定社会生活方式的超技术方面的意识和政治活动;而后者却是从社会生活的研究出发,然后及于表现意识和政治活动的技术事物。好比是同样内容,章节相同,但安排的秩序及页次却各不相同。”^①

文化人类学是形成与达尔文 1859 年提出的生物进化论有直接的联系。“人类学是达尔文的儿子,达尔文的学说使人类学成为可能。”^② 其实,早在 1843 年,德国文化史学家克列姆(Gustav Klemm)在其《人类文化通史》中已经列出了人类社会经由了“野性”“开化”和“自由”三个进化序列。而在 1852 年,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进化的假说》中将社会类比为生物有机体,并提出了社会单线进化的思想。^③ 只是由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人类科学史上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人类学搭上了生物进化论的车而形成为一门研究文化的学科,也使人类学具有了科学的性质。他们是用生物进化论来解释人类生活的差异,相信人类和世界都遵从自然、外在和既定的进步规律。事物是通过不断分

① 转引自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 页。

② 转引自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7 页。

③ 参见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9~40 页。

化组合,沿着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同质不整合到异质整合的方向发展。他们根据日益增多的民族学资料,参照生物学和地质学家的自然史来构拟人类文化发展史,历史地探讨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过程,特别是宗教、法律、财产、家庭和国家的起源与进程。从而得出人类追求进步的心智与本质同民族文化进化的路线与阶段是一致的,显示出民族社会文化与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一致性。这就是所谓的经典进化论。经典进化论的创造者们,似乎觉得自己是在为学术、为宏伟的事业、为世界的公正而含辛茹苦地艰难跋涉,但是,他们却忘记另外一个根本的事实,他们所在的民族,所在的国家、政府,之所以容忍他们的研究,支持他们的研究,甚至直接出资为他们的研究创造条件,并非无事找事做,而是希望在他们研究结论中获取直接的功利报偿,并为他们的结论喝彩。19世纪中期以来,文化人类学之所以被推上前台,正是这种喝彩的直接表现。

经典进化论的先驱者们,一直坚持着自己文化进化的潜在“公理”,即西欧各族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善的民族,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他们对进化缓慢者的进军与征服,正符合这一“公理”所确定的原则。他们报道了黑非洲、北美印第安人的愚昧和野蛮,试图证明其在进化上的落伍,从本质上来说是在为“绅士风度”的文明唱赞美诗。他们揭示澳洲土人社会组织的原始和远东民族对理性的压抑,从本质上来说是在为自认为有扶弱济贫的“骑士风度”注射兴奋剂。当他们的结论受到西方世界一片喝彩时,他们的工作正在被支持他们的“文明人”不择手段地加以应用。科学的本质就在于付之应用,文化人类学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没有例外过,遗憾的是,我们对这种应用在感情和伦理上都不敢苟同。

随着老大殖民帝国的迹象逐渐露出了端倪,鼓动扩张和征服的浪潮平息之后,经典进化论作为殖民者心理平衡剂和征服活动理论的依据也就连同它自己一道退出了历史舞台,只剩下一大堆茶余饭后谈论的海外奇闻。这时候播化学派异军突起,对进化论发起了强烈的攻击。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同样是受到了时代和具体文化的驱使。他们宣称文化具有空间的位移和随机的组合能力,力图把全部人类史归结为文化联系、冲突、借用、转移的现象。^①表面上看是一场学术之争,实质上却是新兴的德奥各民族向英吉利殖民帝国的挑战。他们宣称文化只能骤然创造,

^① 参见C. A. 托卡列夫《外国民族学史》,汤方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8页。

只有个别民族在个别时间内才具备创造文化的能力，就其本质来说，只不过是作为英吉利殖民帝国的挑战者充当鼓动剂，鼓动他们去充当文化的新创造者。文化人类学再一次被推上了应用的前台，这同样不是播化学派中个人的功过，而是时代在潜移默化中赋予了他们的使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秩序发生了剧变，中欧帝国的迷梦既然成了泡影，作为鼓动剂的播化学派，当然自动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开始萌动，南欧和爱尔兰的激变，使机械延续的老殖民体系变得千疮百孔，成了食之无肉弃之可惜的鸡肋。这时候应运而生的功能学派，只好公开亮出帮助殖民政府实施间接统治的旗号，以赢得自己的立足之地和找到了自己应用价值的出发点。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努力同样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成为泡影。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的功能分析法教会了人们如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樊篱，去认识自己未知的民族。在这一点上，他们和经典进化论、播化学派似乎是殊途同归，即研究者个人原所自信的被历史无情地否定了，而他们研究中的副产品却始料不及地成了人类智慧的财富，我们景仰这些先辈，恰好是立足于这些财富的分上。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1945年至1970年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社会主义形成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垒，从而使新兴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地位突出；其次是发达国家进入社会均富和大众消费时代，人们由追求生存和安全转向对生存意义和价值的追求；再次是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使世界呈现出空前的现代性，而使人们生活的基本性质更加难以把握，由此使以现代化为依据的权威定义和单向的话语受到质疑；最后，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原先认为读过大学就能进入精英阶层的人们地位失重，产生革命意识，广泛参与社会活动。

世界的时局发生了令欧洲中心主义者瞠目结舌的逆转，诚如基辛（R. Keesing）所比喻的，原先被欧洲人放到显微镜底下观察的对象，现在逃出了显微镜，并操起了显微镜，把原先的观察者装了进去。第三世界各民族既然要与新老殖民主义者周旋，既然要与强权政治抗争，就得有自己的文化人类学，就得把与他们打交道的民族放到显微镜底下进行观察。^①这是时代的必然，任何个人和单个民族都无法逆转的历史潮流。对这样的世界，坚持传统观念的人自然不少，要求变革这门学科者更是有大有人在，于是围绕着文化人类学的应用问题一场不可避免的论争在文

① 基辛：《当代文化人类学》，于嘉云、张恭启译，巨流图书公司（台）1981年版。



化人类学界爆发了。在这场论争中由于传统的文化人类学在应用上所走的道路，在当今社会中已经变成了无可奈何的古董。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指传统的研究办法）与现实的应用完全脱了节。当今世界上的人们不管是出自欧美的发达民族，还是第三世界的发展中民族，都会自然而然地追问这样一个问题：你们整日从事的原始群婚制度研究，已成遥远过去的巫术，部落社会的酋长，先有母系先有父系的争论，在当今剧烈冲突的世界上，究竟能够派上什么样的用场？在这一连串充满轻蔑、怀疑，甚至是嘲弄的睽睽众目之下，修补理论与应用上差距的企图开始萌生。应用文化人类学就在这样的全新背景下被当做旗号亮了出来。

站在发达民族的立场，当然有他们自己的理由，为了保证现有的发达永世吉昌，自然得研究在某种程度与这种发达直接相关的第三世界民族。于是，波拉尼的经济人类学，奥本海默提出的政治人类学和米德奠基的教育人类学，在这时被赋予了应用的价值，要求对这一学科的深入研究，能找出帮助发达国家摆脱困境的道路，甚至是可供直接操作的计划模型。这样一来，一大批从传统文化人类学科中培养出来的来自各个民族的新一代学者走出了书斋，投身到亚非拉各个角落，去直接参与各式各样的改革计划和扶助计划。康奈尔-秘鲁维科斯发展计划就是这方备受肯定的成功典型。^①但是当这项工作深入一步时，问题又出来了，不少热衷于文化人类学应用的年轻人，在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后猛然发现，他们所希望扶助的对象和希望实现的变革的利益所在，恰好与支持他们从事科研的政府、企业、基金会的利益格格不入，甚至针锋相对，他们一下子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马文·哈里斯在其著作中所表露的抱怨和苦恼正是这方面的真实写照——“要想全力达到某一实际目标的，人们常常会搬弄辞令，要哄骗，用真假参半的报告或彻头彻尾的假报告蒙蔽人，要进行恐吓，甚至要动用暴力”。^②接下去的事实是应用人类学家们面始料所不及的大嘲弄，亚非拉各民族国家凡不是欧洲各国的附庸者一概拒绝文化人类学家从事调查。不管他们是以个人的身份还是参加某个和平团体，或是承担某个基金会的研究任务，都吃了闭门羹。事情很清楚，文化人类学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界圣殿，而是具体的民族和文化手中的工具，文化人类学家要么操起这个工具为你的支

① 参见克莱德·伍兹《文化变迁》，施惟达译，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② 参见马文·哈里斯《文化人类学》，李培荣、高地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58页。

持者服务，要么得为自己寻求相反的支持者，二者必居其一，无退路可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第三世界各民族的兴起，传统的研究落后民族的文化人类学自然被逼到了死胡同。西方文化人类学界近二十年来对文化人类学立场的大争辩，正是西方文化人类学出于阵痛期的必然现象。在这场争论中头脑最清醒，最敢于解剖自己的人首推高凯林，她坦白地说，就是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只有西方的附庸国才会欢迎欧美的人类学家去作调查。在主权完整而真正独立的国家中，西方的人类学家通常都被视为帝国主义者而不受欢迎；检讨人类学家充当这个角色的历史，则无论人类学家实际上是何等的纯真与无辜，这种立场是十分可以理解的。非常庆幸的是高凯林的坦诚相告获得了有正义感的西方文化人类学家的赞同——文化人类学不愧为是敢于解剖自己、敢于揭短的精神武器，按照高凯林的立场，其逻辑结果就必然是这样。欧美国家构建了自己的文化人类学去为自己服务，先例一开，一旦时机成熟，它就应当有勇气承认往昔的被压迫者也享有同等的权利去构建自己的文化人类学，去对付自己的异族，特别是对自己原先的宗主民族来个请君入瓮。允许民族内代表各民族需要的学派并存，应用时各按自己的需要和任务作出自己的结论，这就是文化人类学应用当中的异种立场并存和分别适用具体民族的原则。若不承认和不按照这一原则去加以应用，就不会成为真正的文化人类学。

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家们面对这样的挑战，应用文化人类学只好把研究的对象转向了国内，接受政府、基金会、企业的资助去研究国内的少数民族问题。于是奥西多·格雷夫斯的丹佛酗酒案研究和麦克·马歇尔对特鲁克岛酗酒现象的分析，^① 鲁宾（Vera Rubin）和考米塔斯（Lambros Comitas Marihuana）的大麻使用跨文化研究被推上了文化人类学应用的前台。^② 在这里他们同样遇上了烦恼，他们的支持者原意是要他们找出消除现有制度不安定因素隐患的办法，而他们的研究却表明，这些少数民族之所以会成为不安定因素的泉源，正好是他们的支持者压迫的结果，立场问题再一次使他们感到伦理、学术、感情的苦恼。于是有正

① 参见马文·哈里斯《文化人类学》，李培荣、高地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40~450页；石舜龙：《应用人类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4~340页。

② Rubin, Vera and Lambros Comitas: *Ganja in Jamaica: A Medical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Chronic Marihuana Use*, The Hague: Mouton, 1975.

